

# 朱一玄与中国小说史料学

钟 扬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中国向来不算正统的学问，因而明清之际李贽、金圣叹的小说评点被正统文化斥为异端。对小说史料之搜集，则似乎更等而下之，因而中国小说史料长期散布在各类古籍之中，无人作专门化的整理研究。致使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东西”自然是小说史料。鲁迅为写《中国小说史略》而“废寝辍食，锐意穷搜”小说史料<sup>①</sup>，书成之后仍每每慨叹“依据寡薄，时虑讹谬”。郑振铎更浩叹当年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研究古典小说，多有“暗中摸索之苦”<sup>②</sup>。足见小说史料，堪称小说研究之基础工程；无此基础工程，任何高明的研究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为中国文化之正宗，以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作为推行白话文的“教本”，致使中国古代小说进入了世纪之初的文化批评与文化建设。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命运与地位。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在“五四”运动前后才陆续有搜集、整理小说史料的著作出版。

然而几十年来，几乎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国小说史料之搜集、整理，在一个庞杂无序的学科领域初步建立了中国小说史料学体系的学者，当属朱一玄先生。

## 一、朱一玄小说史料著述及其体系

朱一玄主治中国古代小说，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是自1946年应聘任教南开大学中文系的第二年开设“小说戏曲选”（选修课）始。五十年代初期，朱一玄由教中国古典文学转而专教明清小说，并开设了“水浒传专题讲授”课。为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他从政书、类书、史书、方志、笔记、杂著、书目以及别集等各类古籍文献中，爬罗剔抉，分门别类，编成《水浒传参考资料》。1964年，在此基础上与刘毓忱合作，编成《水浒传资料汇编》，交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5年排出清样，中经“文革”，直至1981年才修订定型出版。从此开始了他“中国小说史料学”系列工程的艰难建设。

朱一玄所编小说史料著作，分为专书资料、专题资料、综合型资料等多种类型。专书资料除《水浒传资料汇编》外，还有《三国演义资料汇编》（66.2万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西游记资料汇编》（30.4万字，中州书画社1983年出版，上述3种均与刘毓忱合编）、《金瓶梅资料汇编》（48.6万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聊斋志异资料汇编》（48万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儒林外史资料汇编》（45万字，与刘毓忱合编，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红楼梦资料汇编》（77.5万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等六部。

专题资料有《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外3种：《古典小说资料书序跋选编》、《金瓶梅词话人物表》、《儒林外史人物表》，71.2万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红楼梦人物谱》（12.7万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红楼梦脂评校录》（41.2万字，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故事编年》、《水浒传故事编年》、《金瓶梅词话故事编年》、《儒林外史故事编年》等十部。

以后又发展到以时代划分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101.7万

字，齐鲁书社 1990 年出版）这一综合型的小说资料。

继而又编了有关中国小说的辞典与书目。《聊斋志异辞典》（与耿廉枫、盛伟合编，91.2 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出版）、《中国神怪小说辞典》（与陈桂声共同主编，珠海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与刘叶秋、张守谦、姜东赋共同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与宁稼雨、陈桂声合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等著作仍属小说史料的范畴，只是与“资料汇编”在形式上稍有不同。

朱一玄另外还编撰了《古典小说戏曲书目（1949—1985）》（与董泽云、刘建岱合编，31.5 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元明文学史参考资料》（与陈桂声合编，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文史工具书手册》（与陈桂声、李士金合编，150 万字，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等三部书目与资料。这样，朱一玄编撰的范围又有所扩展。

朱编中国小说史料丛书起步于专书资料，而以专题资料辅之，以应某种特殊研究之需，继而以综合资料拓展研究视野。因专书资料只以明清小说中的几部经典名著为对象，而综合型资料则共收自明初至清末 281 种小说的资料，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二三流小说从未有人问津。此为朱编结构之核心层次（第一层次）。

至于中国小说辞典，也是由专书到全方位的大辞典，收录自秦汉至民初之文言小说，自唐五代至清的话本小说，自明初至民初的章回小说，评论、版本、丛书、期刊、研究著作乃至研究机构，正文之后尚有“中国古典小说在国外”，“中国古典小说同书异名录”等 8 种附录，再辅以《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收文言小说正名 2077 种，异名 443 种，共 2520 种；白话小说正名 1480 种，异名 756 种，共 2236 种。两者共收正名 3557 种，异名 1199 种，总计 4756 种）。此前已有孙楷第之《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收 670 种），柳存仁之《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收 131 种），江苏社科院之《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收 1155 种），以及程毅中

之《古小说简目》(收 520 种),袁行霈、侯忠义之《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收 2240 种)<sup>③</sup>,但朱编囊括了迄今为止所有中国古代小说书目和新近发现的几乎全部的中国之古小说,成为集大成之巨著。此为朱编结构之第二层次。

中国小说之近邻为戏曲,其内容与创作方法之相辅相成,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朱编因而有小说戏曲书目之合璧,收录书目 4000 种。这就便于研究者找到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之最新版本与最新研究信息。中国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是一代文学的主流,中国小说研究不能脱离其同时代之文化背景,朱编因而有《元明文学史参考资料》。朱一玄在编撰实践中深知中国小说史料之搜集与中国小说之研究都离不开中国文史工具书之运用,而其教学中发现诸多青年学者不善使用文史工具书,因而又有《文史工具书手册》之编写。此为朱编结构之第三层次

如果说朱一玄中国小说史料编撰的结构体系中第二、三层次属广义的中国小说史料,那么其第一层次则属狭义的中国小说史料。

作为狭义的中国小说史料在朱编中有:专书资料、专题资料与综合型资料。其中专题资料,既是资料又是研究成果,小说故事编年与人物表,都是精心制作的产物。如《红楼梦人物谱》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贾氏谱大要》的体例,把人物世系及亲戚关系用图表列出,庚辰本列男 304 人,女 296 人,共计 600 人。程乙本列男 368 人,女 304 人,总 672 人,且附有“人物年龄对照表”、“人物生日表”、“人名索引”,标出人物在书中首次出现的回目(有的人物表还列有在书中出现的回目)。这种人物表编起来极为复杂,用起来则极为方便。对有疑难的地方,再加注说明,庚辰本人物表出注 57 条,对 77 个人物作了简略有力的考证;程乙本人物表出注 68 条,对 88 个人物在两个版本中的不同及程乙本在人物更动上的功过作了考证与评论。极见功底。

专书资料以明清小说中的七大名著为对象。其中明代小说四

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分别代表了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神魔小说、世情小说之高峰。而清代的三部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则又分别代表着拟古派、讽刺派、人情派小说之高峰。

这七部专书资料则又自成体系，即大致分为本事编、作者编、版本编、评论编、影响编等五个梅花瓣。在具体操作中则根据专书实际，稍有变化，如《红楼梦》未设“本事编”，《儒林外史》未设“影响编”，《水浒传》多一“注释编”。《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于正编之外另设“附录编”。在稳定的结构中显示了运用的灵活性。

而其五编式的结构体系则体现了朱氏明确的小说史料书籍编写原则。

其一，本事编。中国古代小说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积代演变型的，如朱编七部名著中的《三国》、《水浒》、《西游》；二为文人独立创作型的，如朱编中的《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前者皆有本事可考，即使是文人独立创作的也都有故事原型与人物原型可求索，唯《红楼梦》按胡适之“自叙传”说其本事与作者同源，故朱编略其“本事编”。从文学发生学观念看，朱编对作品本事之求索完全不同于“索隐派”之对号入座，而在于探讨从生活原型到文学形象的创作方法与规律，更为了解文学作品从初具模型走向高度典型提供了重要途径。

其二，作者编。由于历史的偏见，“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sup>④</sup>。小说作者名不见经传，有的甚至不敢或不愿将自己的名字署之于作品之上。中国小说作者之史料不仅极少而且极其零散，致使有的小说如《水游传》、《金瓶梅》、《红楼梦》作者之谜，久讼难决；有的作家之生平事迹极其朦胧难辨，如施耐庵、兰陵笑笑生。“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sup>⑤</sup>所谓知人论世，知人论文，在中国小说研究中实为相当薄弱的一环。朱编则为深入研究中国小说创作主体提供了丰富的原

始史料。

其三，版本编。中国古代小说之出版历来不正规，各种书坊刊刻之风格不一（有的甚至随意改动原文），同一书的各种版本之风貌不一，因版本之不同甚至同一作品显示了不同之主题思想与艺术成就，同一人物显示了不同思想性格与艺术风格。对中国小说版本之求索，或由此引起的小说版本之争，始终是中国小说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朱编则为中国小说版本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线索。

其四，评论编。这是朱编的重头戏。中国小说研究史上对小说文本之研究大体有三种类型：一为评论派，以序跋为主要形式，偶有专文辅之。二为评点派，以李贽评点水浒开其端，将诗文评点的方法引入小说评论，是中国小说研究的一大特色。同一部小说往往有众多评点，也有同一评点家对同一小说多次评点，如脂砚斋评点《石头记》就至少有四次之多。三为杂评派，他们非专评小说，或非专评某一小说，只是在其文章（有时为诗词）中偶一言及小说或某一作品，虽为杂俎亦时有可观之辞。朱编对多类史料作了大规模的搜集，为我们进行小说文本研究、小说批评史研究、小说美学研究，都提供了丰富的宝藏。

其五，影响编。朱编涉及的七部小说名著，各自代表了一种创作模式的高峰，每一部名著都引出了一大批同类型的小说，并多被改编为各种剧种的戏曲作品。不仅如此，它们对社会乃至中国的民族性格与精神都有着不可抹煞的影响，诚如鲁迅所言：“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sup>⑥</sup>。因而朱编除《儒林外史》没有影响编外（其实《儒林外史》对晚清谴责小说乃至鲁迅小说都有影响），都细列这些名著对小说、对戏曲、对社会的影响，让人既看到小说名著的文学影响，又能看到小说名著的文化效应。

中国小说研究五彩缤纷，千头万绪。综其大者，大抵不出朱编之五大范畴，尽管不同研究者在侧重点与方法上是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由此逆推，足见朱编专书资料之结构体系，完全是从中国小说研究的实际出发并以此为依据的。这大概是朱编受到小说研究者之普遍欢迎的根本原因。

《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就整个小说史而言它是断代的，就明清时代的小说而言它是综合型的。这本书参照并综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袁行霈和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等书对古代小说的分类原则，自创新则，将所收明清小说分为七编：第一编历史小说，收“讲史”类作品，先按故事的朝代次序排列，而于每一朝代中再以作者时代为次；第二编侠义小说，收“说公案”的作品，又按其内容分为“侠义”和“精察”两个子目；第三编神魔小说，收“灵怪”类作品；第四编世情小说，收“烟粉”类作品，又分“人情”、“狭邪”、“才子佳人”、“英雄儿女”、“猥亵”五个子目；第五编讽谕小说，又分“讽谕”、“劝诫”两个子目；第六编话本小说，收白话短篇“总集”；第七编文言小说。具体到每一部小说的资料，一般以史料著者时代先后为序。惟《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六部小说的资料，先按内容分类（前三部分为作者、本事、作品三类，后三部分为作者、作品两类），然后再将各类资料按其著者时代先后排列。

《明清小说资料选编》收录了自明初至清末 281 种小说的资料，包括小说的序跋、凡例及有关考证、评论（与专书资料相比，主要削弱了版本与影响方面的史料）。它不仅为以名著为主体兼及其他众多作品的中国小说研究格局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更从一个特定角度大规模地展现了明清小说的发展脉络与研究历程。

无论是专书资料还是综合型资料，朱编有五项操作规范。一是取材只收古、近代的资料，即主要辑录“五四”运动以前的论著。朱氏在浩瀚的古籍中搜求，在庞杂的文献中筛选，取材极其丰富又极其精当。“五四”以后有关考证的资料则只酌情略收少量。既有原则规范，又有适当的灵活度，从而扩大信息面，开拓研究

者之视野。二是所收资料皆保存其本来面貌，但也不是原文照录，而多作了精当的校勘。对于所收资料原文中的错字或应删去的字、拟改上去的字、增补的或注释性的文字，均不径删、径改、径补，而以各自特殊而总体规范的符号标出，这样既存其真，又勘其误。三是各条资料的标题，对于史籍和笔记采用书名，对于诗、文则标出原题，并在其末尾注明所在书的位置，以醒眉目。四是鉴于蒋瑞藻《小说考证》所辑资料只有书名，未注著者、卷数和版本；鲁迅《小说旧闻钞》虽写出卷数并在《引用书目》中著录了作者，却仍未注明版本；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又只有著者而没有卷数与版本，使用起来都不方便，朱编所收资料尽可能查对原书，注明著者、卷数与版本，大大方便了读者。

除上述四项之外，朱编还有一项重要的操作规范，那就是朱氏在众多的史料原文下加有“编者注”。这些编者注有多种功能，以《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为例，大致可分为：一、对小说作者的考证。如《水浒传》作者部分《施耐庵世籍考》（胡瑞亭）的“编者注”，引用刘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一文的“几点简短的结论”，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真实可靠的、能排斥任何反证的人物、史料可以证明施彦端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二、对小说书名的解释。如《前后七国志》的“编者注”云：“《前七国志》，即《孙庞演义》，明吴门啸客撰。《后七国志》，即《乐田演义》，清徐震撰，题古吴烟水散人演辑。”三、对资料作者的考证。如《明容与堂本水浒传》卷首有四篇评介文字，其中《批评水浒传述略》为明怀林作，另三篇《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及《又论水浒传文字》未题作者，朱编定为明无名氏作，并在《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下加“编者注”云：“此文及以下《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又论水浒传文字》两文，《明容与堂本水浒传》均未题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影印《明容与堂本水浒传》的出版说明中，认为书的正文前的四篇文字，全是怀林作。”再如《西游记序》（元虞集）的

“编者注”云：“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五云：‘《西游证道书》一百回，清汪象旭评。自象旭此书始冠以虞集序，以为邱长春作，并谓得古本，据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一回，实则此回乃象旭自为之，与古本无涉’。按：明人吴承恩《西游记》，自不可能先有元人虞集为之作序。那么，《西游证道书》的这篇序文，便有了两种可能：一是汪象旭假托虞集之名的伪作；二是汪氏自他处移来放在这书的前面，但目前尚未在《道园学古录》等书中找到此文，只能存疑。”四、对资料版本的考证。如《武穆精忠传序》（明李春芳）的“编者注”云：“《武穆精忠传》冠以李春芳序，乃误以《精忠录》序移置此书者。”五、对资料内容的评介，如《朴通事谚解》（朝鲜边暹等）的“编者注”云：“《朴通事谚解》是一部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里边所引《西游记平话》残文，可以作了解吴承恩《西游记》创作过程的参考（参看赵景深《谈西游记平话残文》，《文汇报》1961年7月8日）。”六、对资料的取舍的说明。如《三国演义》本事资料，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晋陈寿）后加“编者注”云：“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无疑是《三国演义》小说的最重要的历史依据。但由于卷帙浩繁而又容易看到，这里就只举《诸葛亮传》的正文作为代表。”对于有参考价值却未收的资料，也在“编者注”中存目，以便读者检索。如《水浒传》本事编《茶香室续钞》（清俞樾）的“编者注”云：“《茶香室三钞》卷三有《高俅》条，卷七有《一丈青》条，《茶香室四钞》卷三有《刘豫》条。”朱编中这些编者注不仅大大扩充了其小说史料的容量，更大大增强了学术性。

上述“五编结构”与五项操作规范，就构成了朱氏较完备的中国小说史料学体系。

## 二、朱氏小说史料的学术地位

中国小说史料的专书，较早的是1916年出版的钱静方的《小

说丛考》，对所收作品虽与正史、野史、私家笔记相比勘，以考证它的来源是否有据，但它兼及戏剧、传奇、弹词，而小说的分量甚少。其次是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蒋瑞藻的《小说考证》，辑录有关金元以来470多种小说、戏曲的作者事迹、作品源流、内容情节及前人对作品的一些分析评价等资料，并包括一部分晚清以后的翻译小说的资料，真正的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大概只占全书的四分之一（1931年蒋氏又出版了《小说枝谈》，所收者仍是戏曲多于小说）。这种杂芜现象反映编者缺乏严格的小说观念。直到1926年出版的鲁迅《小说旧闻钞》，才专收小说史料且考证精当，历来为学人所称道，但毕竟只收了41种小说史料。后来孔另境又在《小说旧闻钞》的基础上采录宋元明清各家笔记中有关小说的史料兼收蒋编中小说史料，编成《中国小说史料》，初版于1936年，涉及小说66种。这些都属综合型资料，五十年代均被再版。

从1949年到“文革”，新出版的小说史料书籍也屈指可数。如专题资料有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出版）、何泽瀚《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王晓传（即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等；专书资料有魏绍昌《老残游记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孽海花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马蹄疾《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内部发行，1980年正式出版）等。这些小说史料书籍虽较解放前的大有进步，但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文革”之后，包括朱编小说著述在内，各家出版社出版了为数可观的小说史料书籍。专题资料有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

选》(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曾祖荫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2 年出版)、大连图书馆参考部编《明清小说序跋选》(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3 年出版)、江苏社科院《施耐庵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年出版)、刘操南《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年出版)等;专书资料有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出版)、栾星《歧路灯旧闻录》(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2 年出版)、侯忠义等《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方铭《金瓶梅资料汇录》(黄山书社 1986 年出版)、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7 年出版)、周钧韬《金瓶梅资料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出版)、魏绍昌《吴趸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出版)和《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等;综合型资料有张菊玲《明清章回小说研究资料》(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 1981 年印本)。各类中国小说的辞典与书目,更是层出不穷,不可胜数。中国小说史料书籍,从此蔚为大观。

朱编专书资料与综合型资料,有的在小说史料家族中是首次出现的,如《三国演义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金瓶梅资料汇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有的则是在前人有关小说史料的基础上再编的。但无论是首创的还是再造的,均具有较鲜明的特色。

就体例而言,朱编之外的小说史料书籍虽各有其体例,但不如朱编那样规范合用。如一粟所编《红楼梦卷》在朱编之外尚数上乘者,其书分为六卷:卷一是关于曹雪芹和高鹗的材料;卷二是《红楼梦》的各种版本的序跋(包括续书、戏曲和作品的序跋);卷三为专著,即专门评论或考据《红楼梦》的作品;卷四勉强可说是杂记,计有笔记题识、诗注曲话、日记尺牍、公文善书等;卷五为对《红楼梦》题咏的诗词;卷六为文论。这样第一卷以内容分类而其他五卷以史料文体分类使全书体例不一,而且以文体分类将版本、评论、影响

方面的史料混为一体,不便读者使用。

就容量而言,以专书资料相比,如朱编《红楼梦资料汇编》是在一粟《红楼梦卷》之后编成的,“两书除体例不同外,取材也各有侧重,以本书新增者而言,则是:在作者编中收入清宫档案等资料;在评论编中收入甲戌、己卯、庚辰、戚序本等4种脂砚斋评本的评语及王希廉、姚燮、陈其泰、哈斯宝等4种评本的回评;又在版本编、影响编中收入今人研究成果”<sup>⑦</sup>。从而较一粟辑录本多出32.5万字。《水浒传资料汇编》比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多出26.4万字,160条资料。《金瓶梅资料汇编》比侯忠义等《金瓶梅资料汇编》多出6.6万字,71条资料。以综合型资料相比,朱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是钱编、蒋编、鲁编、孔编同类书之总和的几倍。仅以用书之数相比,钱编无引用书目,蒋编用书172种,鲁编用书66种,孔编用书172种(按指50年代经赵景深、章苔深、胡忌增订之新编本),而朱编引书多达705种,引用晚清报刊37种。

就校注而言,朱编之外中国小说史料书籍对所收史料原文多未作校勘,如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序言》中指出:“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钩稽。时蒋氏瑞藻《小说考证》已版行,取以检寻,颇获裨助;独惜并收传奇,未曾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时有异同。”鉴于蒋编文字之未校,鲁迅只得重编一本《旧闻钞》。尔后有的编者仍未接受教训,校勘不精,又不出校记,这样就使读者无法了解与判断其校勘之正误,有时则往往有改正为误的地方而不易被读者发现。反不如朱编将原文与改文统统以特殊符号标出,证据不足的悬而不断,留待读者选择与考索。朱编之外的小说史料书籍,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注释较多,但那是对文字的注释,不象朱编之编者注为学术考证与信息型的。鲁编中有编者“案”,相当于朱编之编者注,其中对《西游记》、《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是独具卓见的,但鲁编全书这类案语只35则,其他之同类书这种注或案也都寥寥无几,不象朱编那样有成体系的编者注。中国小说史料书籍,经朱一玄规范而精湛的操作,而具备学术著作的品格;中国小说史料

学,因有朱编小说史料体系,才庶几称得上“学”。

### 三、朱编小说史料的缺陷

实际上,朱氏的中国小说史料书籍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陷与失误。朱编最大的遗憾,是其缺乏中国小说史料学的理论建设。何谓中国小说史料?朱编之前,似只有郑振铎《中国小说史料序》中略有谈及。他说:

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sup>⑧</sup>

首论之功不可没。但这毕竟是三十年代观点,而其所谓小说史料,仅指“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与故事的变迁”方面的资料,当然太狭窄了。

朱编之后,又似只有程毅中在《古代小说史料漫话》中,试图从学理上为中国小说史料作一界说<sup>⑨</sup>。他说:

小说作品就是最主要的小小说史料,然而光有作品还不够。研究小说史,还需要参考其他书,包括作家传记、作品的目录、版本和考证、评论、编辑等各方面的资料。有些古代小说的书已经丢失了,但是还有一些旁证材料,这也是小说史料。例如《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份最古的小说目录,就是探讨中国小说起源的重要史料。有些小说的作者和年代都没有明确记载,就要利用其他史料来进行考证,包括作者的其他著作或旁人的序跋、评论等。

接着作者从关于小说的素材和故事的演变、关于小说的目录、关于小说的作者和版本方面,漫话了中国小说史料。从定义看,程较郑有所前进。

而朱一玄在其标准化操作中所创立的中国小说史料体系,实

则已透露出其中国小说史料的概念。朱氏所谓狭义的中国小说史料概念，就在其专书资料结构体系的五大范畴之内，即关于中国小说本事、作者、版本、评论、影响等方面的史料。它显然较郑、程之说更全面更准确些。

朱一玄曾设有“中国小说史料学”提纲：1. 何谓小说史料学？2. 小说史料学的形成和发展。3. 选题。4. 体例（包括取材、分编、排列、标题、著者、版本、校勘、附注等项，并从已编成的资料书中举例说明）。他所编《古典小说资料书序跋选编》，也为其理论建设作了资料准备。令人可惜的是，朱一玄至今没有写出这部理论著作。他已年逾八十了，大概难得有力量去完成这项理论建设工程。而对完成中国小说史料学的理论建设，朱一玄借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题记的话，说是“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 注：

①鲁迅《小说旧闻录再版序言》。

②⑧郑振铎《中国小说史料序》。

③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程毅中《古小说简目》（中华书局1981年版），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⑤《孟子·万章下》。

⑥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⑦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说明》。

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作者工作单位：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